

百年悬案: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

■丁晓平

(上接第5版)

结论:何叔衡是预定代表,包惠僧是陈独秀指定代表

现在,困扰党史界数十年的一个问题依然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究竟都是谁?

1979年3月14日、17日,叶心瑜、颜广林采访刘仁静记录整理了《回忆党的一大》,1980年3月经刘仁静本人审阅、修改。当整理者询问刘仁静:“出席一大的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包惠僧不算一大代表?”刘仁静回答说:“广东一人,即陈公博”;“旅日一人,即周佛海”。对包惠僧是否代表问题,刘仁静说:“除了上面12个人外,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他是从广东到上海的,但并不是广东组织的代表,我认为他参加一大是作为串门参加的。当时开会对他没有什么保密,他愿意来参加就参加。我看见张国焘的回忆录中说,湖北代表有3个人,即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以前包惠僧曾对我说,他是党的一大代表,毛主席都说他是代表(见《西行漫记》中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陈潭秋的回忆录中说他也是代表。(整理者注:据包惠僧本人对我们说,他当时是广东代表。)但我认为毛主席说代表只有12人,如果只算12人,那就没有包惠僧。现在参加一大的,只有我和包惠僧还活着,无法确定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只好作为历史悬案。”

不过,作为秘密召开的中共一大,刘仁静说“当时开会对他也没有什么保密,他愿意来参加就参加”,似乎不切合事实,因为党组织是有纪律的,代表名额也是有限的。会议期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沈雁冰(茅盾)、邵力子等人虽然知道中共一大召开,还为南湖会议选址出谋划策,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时候,刘仁静也困惑了:“无法确定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只好作为历史悬案。”

这桩历史的悬案,一直悬到了

今天。

如果说,中共一大代表是13个人,那么这个悬案就不悬了,早就落锤定音。但是,如果说,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那么悬案就又悬起来了。

2020年,金冲及先生在《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一文中,以“董必武已经‘放弃’自己原来的说法,问题在60年前的1959年已经澄清,没有再翻出来争论的理由”为理由,以肯定的态度否定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他在文章中说:

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产生不同说法的原因,来自包惠僧是不是大会代表。

包惠僧参加了中共一大,这是事实,没有争论,也不能缺乏根据地称他是“临时参会者”或“旁听者”。既然参加了会议,讨论时也发言,其他与会者未必都清楚谁是正式代表而谁不是,会议组织和主持者也未必在会上对此予以说明。如果说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是哪一个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呢?包惠僧明明是湖北党组织的成员、武汉临时支部书记。湖北党组织已有两位一大代表即董必武、陈潭秋,自然不可能再推出第三个代表。包惠僧是从广东来上海开会的。他其实只是在中共一大开会前一个月的1921年5月底,才临时去广州看陈独秀,并没有在广东党组织内工作。陈独秀那时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不能离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他要包惠僧去参加那次会议。包惠僧并不是广东党组织的成员。只有他本人从1953年起说陈独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除此以外,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特别是广东党组织成员)说过有“开会”和“推选”他为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更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实包惠僧自己的说法。负责一大会议组织工作的李达以及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也不会无端地说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是12个而不是13个,说其中“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这两个地方”中,除日本外,还有一个是哪里呢?一大结束后的初冬,包惠僧仍从上海回湖北担负党的工作,并没有在广东工作。怎么能代表广东党组织呢?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所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很谨慎而又并不含糊的表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陈公博,陈独秀也指派包惠僧由穗赴沪参加大会。”这个写法以安静的心态,“沉”到一所学校,历时六年多,有计划地步步深入,潜心研究,用心开发,精心提炼;其实也是和校长、教师一起过一种教育生活,将研究融入生活之中。只有“沉”才会深,只有“融”才会通,只有“静”才会好,“好文章常在孤灯下”。

其三,“口述史”告诉我们,要有真知。一些看似熟悉的东西并非理解,口述史其实是理解而写,用无知推动熟知,从熟知走向真知,在实践中生成理论,在口述中透视出理性。齐教授也在与我们对话,“口述史”让我们触摸到改革者的“心跳”。这部“口述史”具有鲜明的主题,即学校变革。学校必须变革,这是学校内在的需求,更是时代的呼唤。变革的实质是创新,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创新才会带来文化的进步。“口述史”印证了恩格斯一个著名的判断:“文化上的每一次进步,都让我们向自由迈进一步。”变革的力量应是文化的力量,变革的方式应是文化的方式,变革的过程应是文化进步的过程。学校变革的实质是在文化进步中迈向学校自由、创造的最高境界。

“口述史”中一所学校的“前世今生”“披荆斩棘”都是在“朝花夕拾”中进步并登上文化制高点的。那么,在学校变革中,校长该做什么?“口述史”从校长生活史叙事的角度进行分析;社会巨变中的成长、农村经历的启示、工厂经历的体悟、大学经历的沉思——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丰富的生活阅历,让校长发现

是慎重的,恰如其分的。

总之,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陈独秀指派来参加会议的)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他们两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中国共产党那时刚诞生,缺少经验,那时候在会上不会有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报告,有些事当时没有讲明白,容易使有些当事人误会来参加会议的人(除两个外国人外)认为都是一大代表,从而给后人造成一些困惑。好在现在还留下当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董必武也声明“放弃”原来的说法。作为当事人的毛泽东又明确批示并一再强调一大代表“是十二人”。事情很清楚。后人固然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必把简单的或已基本清楚的问题再过分复杂化。

对金冲及先生的这段结论性表述,笔者在经过上述历史考察之后,感觉还是意犹未尽,觉得很有商榷的必要。我想,读者诸君在经过阅读本文列举的史料和文献之后,心中也有自己的意见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确认中共一大代表是12个人,且不像金冲及先生那样否认包惠僧,那么由13个变成12个的“那一个”是谁呢?

毫无疑问,最值得商榷的“那一个”就是何叔衡。

何叔衡到底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呢?

从目前发现的认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位的11份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И·穆尔斯基的信件)、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毛泽东自传》(包括《毛泽东口述》《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等毛泽东口述生平传记内容)、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葛萨还说的《中国共产党初期革命活动》,均为明确列出12位代表的姓名。只有李达1955年接受采访整理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认为长沙代表是2人,有何叔衡。而毛泽东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示上,并没有否认包惠僧。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课时,当

着何叔衡的面不承认他是中共一大代表。K·B·舍维廖夫据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列出的中共一大代表12人名单里,把包惠僧放在广州代表名下,长沙代表只有毛泽东,没有何叔衡。

那么何叔衡干吗去了呢?我们必须应该尊重和相信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虽然他后来变节叛变,身败名裂。但作为中共一大的筹备者和6次会议的唯一主持人,张国焘的回忆相对而言更接近事实真相,且可信。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这个不涉及其他政治敏感或立场的问题,他也没有必要在回忆录中说假话。张国焘认为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同时,张国焘作了补充说明:“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后,心中也有自己的意见了。”

对张国焘的回忆,刘仁静后来的回答是:“何叔衡有没有参加会议,我记不清了。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不够代表资格,就借故叫他提早回去了。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

然而,在人们一直陷于包惠僧和何叔衡两人到底谁是中共一大代表的纠结之时,包惠僧却主动站出来:“张国焘回忆录说,何叔衡不是一大代表,这是乱扯。一大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会议并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合格不合格的问题。我可以肯定,何叔衡是参加一大的。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张国焘还说,毛主席马列主义水平低,与王尽美、邓恩铭差不多。这也不对,那时谁的马列主义水平高呢?”

事实上,包惠僧的记忆也是有误的。何叔衡的确有全程参加中共一大。要不然,他为啥积极响应董白秋关于征集党史回忆录的号召,在1929年12月26日致信董必武,询问中共一大的有关情况呢?而且急切地希望董必武在5日内回复。而从董必武的回忆来看,何叔衡确实对中共一大的召开的时间、代表、地址和大会是否发表宣言等5个具体情形均不清楚。

于是,人们自然有理由产生疑问——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怎么会连这些起码的情况都不知情呢?仿佛他就是一个“局外人”。

关于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的记载,除了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之外,最有力的证据来自谢觉哉的日记。1921年6月29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为了隐蔽,这5个○代表的是“共产主义者”之意。1952年,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乌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关于何叔衡提前从上海回长沙的事情,《谢觉哉日记》也有记载。经查阅《谢觉哉日记》(手稿本),我们可以看到,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说:“晨起追写日记,间断已有四五十天了。”在他补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我因兼顾家事,又身体不健,不欲远出,打算就云山休息,因云山凌波有免职消息,何叔衡又逃械相促,及于阴历七月十五(即公历8月17日)往省”。可见,何叔衡的确已经回长沙了。而毛泽东在参加完嘉兴南湖会议之后,又和萧瑜去了杭州西湖,随后又返回上海,直到8月下旬才返回长沙,其间均不见他和何叔衡在一起的公告。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博文女校开幕。这里是“讲湖南话”的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讲湖北话”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讲北京话”的刘仁静和“讲山东话”的王尽美、邓恩铭等9个人的住宿之地。大会的议程是:7月23日上午召开大会预备会,下午3时正式开幕;24日,各地小组报告活动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27日至30日在李汉俊寓所(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开会、讨论,拟于30日晚闭幕。谁知,最后一次会议在进行中遭法租界巡捕房突袭骚扰,被迫中止。

张国焘回忆说:“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言下之意,何叔衡有可能是参加完7月23日上午的预备会议之后,最多是参加完23日和24日两天的会议之后,在7月25日、26日这两天休会的时候,购买返湘船票,经过一个星期的路途,于8月初抵达长沙,然后“选械

相促”谢觉哉回长沙。谢觉哉是8月17日由宁乡云山动身回长沙,8月19日“午后7时,抵达城南附小学校”。

金冲及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那时刚诞生,缺少经验,那时候在会上不会有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报告。”笔者认为这个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中共一大在7月23日上午召开了预备会,专门讨论了会议的目的、意义和任务,审定了议事日程。马林、尼克尔斯基参加了预备会,并作了报告。更重要的是,大会的主持人是张国焘,许多重要的决定是张国焘和马林、尼克尔斯基商定的,李达主要负责会务工作,其他代表包括李汉俊(当时跟张国焘关系不太融洽)在内,或许都像刘仁静一样,对会议的幕后协商、决定并不知情。更何况,何叔衡的离会,是张国焘等在作出决定后通知毛泽东转告何叔衡的,可见毛泽东也没有参加决策,只是执行而已。

时过境迁,如今历史已走过100年,参与中共一大的当事人在他们的回忆、口述或接受采访所留下的文字记录中,有不同程度的误差甚至错误。当今天的我们试图还原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既不能非此即彼,也不能以甲代乙,或者以这个否定那个,以至再以讹传讹。

综上所述,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张国焘的意见相对更加真实或者接近历史本来的面貌——中共一大预定到会的代表是13人,但出席大会正式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12人(参加嘉兴南湖会议的代表为10人,即: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李汉俊和陈公博未参加。他们10人于8月2日和3日分2批前往嘉兴南湖。8月3日,中共一大在南湖红船完成了全部议程,通过了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当选中央总书记。李达夫人王会梧作为会务人员,被誉为“一大卫士”)。作为中共一大**预定代表**的何叔衡,在参加预备会议(或前两天的会议,即7月23日、24日的会议)之后,即通知离会(笔者认为可视作取消了正式会议的代表资格)。作为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支部书记的包惠僧,在广州被陈独秀指定为中共一大的**指定代表**,全程参加了一大,应该是正式代表。

总之,中共一大的预定代表为13人,参加正式会议的代表则为12人。

从口述史里发现学校变革的力量

■成尚荣

教育的本义与深义,进而叩问规律,敢为人先,上下求索,不断创新实践。因此,学校变革是学校发展的必然主题,是校长崇高的使命。校长在变革中应有的品质与行动,是抱朴求真,守正创新,首先“变革”自己,才能“变革”教师,“变革”学校,在“变革”中不断前行,学校才能提升以致跃升。那么,变革的真正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对教育梦的执着追求,只有在坚定的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才会有深度变革,才会走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的生命旅途中。

值得关注的还有“口述史”的超越性。超越是生活的本质,人应是超越性的存在,学校变革的意义也在超越。口述史不只是让我们回望历史,还要关照当下,当然还要前瞻未来。“口述史”的价值在于引导我们去超越;而超越其实是意义的创新与提升。齐教授整理、撰写的这部“口述史”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所超越:

其一,口述史研究认知与方法的新拓展。齐教授对口述史有着很深的研究,这次通过“口述史”的整理、撰写,研究有了新的拓展、深化。她认为,口述史的研究要与口述者的生活史研究相结合,运用生活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纵向的线索;同时将历史事件作为横向的线索,分析出不同的个人命运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在这纵横之间,“一种具有整体观的口述史研究才有可能实现”,才能“更加贴近人脚下的土地……解释他所生活的世界”。所

以,口述史研究的路线是,首先去“理解口述者的人生,从人生里看故事,从故事里看事件,再从事件里看历史”。在这本“口述史”研究中,价值观与方法论、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统一在一起,形成了口述史研究的历史坐标。这一坐标的构建,避免了一般口述史研究容易产生的“闲言碎语”“供人娱乐”等问题,其效果一如鲁洁老师所言,“一种生命史、生活史,它其实是对宏大叙事的历史的一种补充”,通过细节化、鲜活的个人经验,提取出一种历史的走向(《回望八十年——鲁洁教育口述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齐教授的这本“口述史”格局较大,而且充满着历史的关照、人文的关怀。读“口述史”就是让我们回到生活中去,无论是既往的,还是当下的,就是让我们与历史相遇,在“历史的闪现”中,我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教育。在这样视野下的“学校变革”才有历史的厚重感。

其二,基于口述真实性的学术透视。齐教授的“口述史”是历史的真实的叙述,是校长真实的经历,是民办学校“内忧外患”生存境遇的真实,是敢为人先、创业创造的真实。真实是口述史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但是,作为口述史,不能止于真实,重要的是基于真实的学术提炼与透视。这本“口述史”紧紧扣住学校变革这一主题,以此为纲,将学校变革的思想、理论等问题渗透其中,提取客观规律与历史走向。她将学校变革的目的聚焦于形成教育品质。教

育品质,不仅是学校的特色和风格,更是高水平育人体系的构建,旨在学校高质量发展。“口述史”透视出以下一些学术性问题。

一是学校“特立独行”问题。特立独行,指的是思想之解放,主张之独特,办学思路之创新。需要说明的是当下校长办学缺失思想,缺乏个性,也缺少应有的勇气。“口述史”里那位钱校长有着“披荆斩棘”“举重若轻”的勇气,而勇气说到底是由实力作基础作支撑的。二是遵循规律问题。办学定有规律,办学规律依循于教育规律,还要依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还有一个规律不能忽略:社会发展规律。几种规律的叠加,整合成以学生发展为本,以高品质发展为基石的办学规律。三是理论根基问题。教育理论是十分丰富的,校长如何从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读书、思考及办学实践中生成自己的理论,是对校长特立独行办学能力与理念的挑战。

“口述史”中的钱校长提出了教育力的概念;他认为“教育力是指人类社会通过教育过程,使教育者素质全面提升的能力”,教育力有五个要素:教育思想和学校文化、教师素质和学生素质、学校的资金和设备、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教育方法与教育科研等。又将教育力与教育关系进行对接,最终实行的是教育与学生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口述史”从劳动与劳动者的角度对教育力进行深度剖析,由此对民办学校的运作机制进行探索与构建。因此,这



《变革学校——一位中学校长的口述史》,钱锋口述、齐学军访谈整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年7月,39.80元

部“口述史”透视了一些理论命题,是一本既有实践品格又有超越性的学术著作。

其三,一个样本意义的普遍映照。“口述史”是一部较长的口述历史,是一所学校的变革史,是一所民办学校的发展史。但它的意义超越了一个校长,也超越了一所学校,即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意义的超越性在于,用“代表性”来表达教育变革的启示:“不只是把学生送进大学的教育目标,而是不断寻求教育‘回家’的路的意义追寻”,“国际化的基础教育的冲击”的外部动力,“智库的重要性”的思想运用等等,几乎所有学校都会发生,都有一定的适用性……这些都会带来学校变革。而学校变革将引导学校走向教育的深处,触及教育的内核,向着未来迈开创新的步伐。

也许,学校变革是在一本口述史中闪现的,未来教育也往往从一本口述史开始出发的。